

行动的重构与主体的回归

——阿兰·图海纳行动社会学的理论发展与再思

吴富兰 熊跃根

内容提要:本文系统梳理了阿兰·图海纳的行动社会学理论,聚焦其以“主体”为核心的社会行动观与社会变迁逻辑。首先,行动社会学将社会行动置于理论中心位置,视其为行动者重构社会意义与规范的创造性实践。其次,行动社会学阐释社会变迁的场域与动力,揭示集体主体通过社会性运动争夺历史质控制权、推动结构性变革的机制;同时提出“社会学干预”方法,以识别并催化集体行动的变革潜能。最后,面对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性危机,行动社会学转向关注“主体化”机制,强调主体在抵抗异化、重建团结中的核心作用。由此,行动社会学构建了联结个体解放与社会转型的分析路径,不仅深化了对社会生成与变迁机制的认识,也为理解中国社会转型中主体性的迸发与新行动的涌现提供了重要理论参照。

关键词:行动社会学;社会行动;历史质;主体化;社会变迁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21世纪,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危机交织,深刻重塑着人类社会。经济不平等持续加剧、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移民规模不断扩大、民粹主义浪潮蔓延以及文化认同日趋多元,共同构成了当今世界的高度不确定性,也使得社会学传统分析范畴渐趋模糊。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指出,当前社会所经历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结构或制度演进,而是深层次的文化转型,其核心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认同方式与行动模式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Touraine, 2007b)。

早在20世纪60年代,图海纳便指出工业社会将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

作者简介:吴富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熊跃根,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比较福利体制、社会理论。感谢匿名评审专家与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文化将取代生产关系成为社会冲突的核心场域(Touraine, 1971)。1965年,他在博士学位论文《行动社会学》(Sociologie de l'action)中初步阐释了这一思想,1973年在《社会的生产》(Production de la société)中系统构建了行动社会学(sociology of action)的理论体系。行动社会学是法国当代社会学四大学派之一^①,在法语世界影响深远(李培林, 1997),但在英语主流社会学研究中并未获得足够重视。英语学界或因对法国社会学认识论传统相对陌生,加之知识框架和学术旨趣的差异,常将图海纳标签化为社会行动、后工业社会与现代性的一般理论家(Beckford, 1998),或将其简单视为社会运动理论家(Rucht, 1991; Vandenberghe, 2024),致使其理论贡献被大幅简化甚至忽视。实际上,行动社会学的思想渊源具有多元性,既继承了涂尔干对社会整合的关怀与马克思对行动者历史作用的核心论述,又摒弃了二者的决定论倾向,同时吸收了韦伯对主体性和文化意义的深刻洞见(Scott, 1991; 李洁, 2009)。该理论还深受战后美国社会学影响,与同时代的布迪厄、哈贝马斯、吉登斯等学者的思想进行对话和交锋。图海纳致力于构建宏大理论,以重新定义社会学的核心议题,回应社会形态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Rucht, 1991)。他深刻剖析了西方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动力机制,构建出分析社会结构与行动互动的理论工具,在探究人类如何创造历史这一议题上具有先驱意义(Bauman, 1983)。此外,图海纳发展出“社会学干预”(sociological intervention)方法,以识别具有社会变革潜能的主体并激发社会变革的集体力量。正因如此,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赞誉图海纳是二战后唯一真正践行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箴言的社会理论家(Alexander, 1999)。

行动社会学借助“历史质”(historicity)和“主体性”(subjectivity)等概念,在强调行动者能动性的同时将其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丰富了对西方社会变迁的解释,也为中国转型研究提供了富有穿透力的分析工具(沈原, 2007)。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全方位的转型,这一进程既依托于国家的宏观制度安排,也离不开基层干部、企业家、社会组织和普通个体的能动实践,他们共同参与并塑造了转型进程(孙立平, 2005; 沈原, 2007;

① 其他三大学派分别是: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生成结构主义(genetic structuralism)、雷蒙·布东(Raymond Boudon)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以及米歇尔·克罗齐埃(Michel Crozier)的战略分析理论。

文军,2017)。中国转型的复杂经验挑战了西方结构主义、国家-社会范式和市场转型理论,要求学者超越对结构与制度的抽象分析,建立能同时观照结构约束与主体能动、制度革新与文化流变的新理论范式(肖瑛,2014;李友梅,2024)。沈原(2006)因而倡导从行动社会学中汲取灵感,将研究重点从结构转向行动,形成本土化的转型社会学问题意识。自2002年《行动者的归来》繁体字译本出版以来,行动社会学及其社会学干预方法已被广泛用于分析中国快速市场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的都市运动、劳工阶层形成与基层治理等议题(沈原,2006;施芸卿,2007;刘建洲,2014;肖林、陈孟萍,2021)。这些研究显示,中国转型中的行动者虽受制于国家和市场的力量,但仍展现出突破结构约束的强烈意愿与行动能力。他们在具体实践中重塑社会关系、激活公共议程并引发制度回应,亦彰显了行动社会学解释中国转型现实的理论价值与方法潜力。

鉴于此,本文将以图海纳的重要著述为核心文本,探讨下列三个问题:第一,图海纳的行动社会学如何界定社会行动?第二,行动社会学如何挑战传统范式,对社会变迁逻辑进行批判性重释?第三,面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引发的现代性危机,行动社会学如何以“主体化”为核心,揭示当代社会变迁的新动力?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本文旨在探寻行动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变迁及发展的理论关联,深化对中国社会转型特征的理解。

二、行动社会学的理论基础:社会与社会行动

现代社会理论的发展往往与对社会危机的反思相伴而生。从涂尔干对失范的忧虑,到韦伯对理性化“铁笼”的洞察,社会学家不断通过界定社会本质回应时代命题。二战后,法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动,社会学研究重心从涂尔干学派强调的社会整合转向对社会变迁的追踪与分析(胡伟,1988)。图海纳则直面“社会何以生成”这一核心命题,批判功能主义与结构主义,主张社会应被理解为行动者通过价值导向的行动持续建构的产物(Kivisto,1984)。这一立场将社会从静态“实体”转化为动态“过程”,是理解行动社会学的关键。

行动社会学的理论萌芽是图海纳对工业社会核心行动者即工人境遇的考察。他发现,生产领域的技术变革正在重塑社会生活:技术官僚凭借知识

垄断确立统治地位,权力操控从劳动生产延伸至日常生活,甚至直接介入价值观与文化领域,意图改变个体的观点、态度、行为乃至个性与文化(Touraine, 1995:243-251)。基于此,图海纳提出“程控社会”(programmed society)的概念,用以隐喻现代社会对技术和官僚系统的制度性依赖(图海纳,2003:163)^①。在这样的社会,知识生产与管理系统的控制权已成为权力的核心(Touraine,1971)。伴随这一转型,社会冲突的本质亦发生转变:

昔日是那些具有创造力的生产者对抗固化的权力与世袭秩序。如今,面对统治机器与支配阶级主导的态势,冲突已经变成人类对自身经验与表达自主权的捍卫,以及对管理或掌控影响自身变革的能力的诉求。(Touraine,1977:160)

在图海纳看来,法国“五月风暴”、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及反越战运动等集体行动,不仅标志着传统阶级政治式微,更预示着新型社会运动的兴起。这些以身份认同为核心的新型社会运动,超越物质利益和权力诉求(如改变不平等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等),通过重新审视健康、性别等被排除在国家生活之外的私人议题,将自由、平等和参与诉求延伸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质性地改写着社会的深层架构(Touraine,1985)。

如何解释这些看似碎片化却影响深远的集体行动?新的价值观、规范与制度是如何形成并取得主导地位的?图海纳(2008)指出,战后西方社会的剧变暴露了自涂尔干以来的古典社会学在解释社会变迁时的乏力。例如,结构功能主义将社会看作价值主导的稳定系统,行动者则被设定为社会结构中的被动者。这否认并掩盖了人在社会建构中的关键作用,也忽视了社会结构本身可能孕育的新意与突发变革,因此无法对不断变化、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做出有效分析(图海纳,2008:13-19)。而同期许多批判功能主义的思潮,或将行动者消解于系统,或割裂二者关联,最终都沦为“反社会

^① 图海纳虽曾偏好使用“程控社会”这一概念,但在1997年英译本《我们能否共同生存?》出版之后,其英译作品中更广泛使用的是“后工业社会”这一术语。笔者认为,这可能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程控”一词隐含了现代社会“可控性”预设,与图海纳对现代性“不确定性”的诊断存在根本冲突;第二,“程控社会”难以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理性力量对社会的强烈冲击以及制度性危机的加剧。基于上述考量,本文采用“后工业社会”这一表述。

学”，甚至导致社会学扭曲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图海纳,2008:13-17、69)。

行动社会学的突破在于重构社会本体论,主张以“一个自我运作的社会形象”取代那种将社会理解为“一套功能、规则、技术以及对环境需求的反应”的视角(Touraine,1981:141-142)。现代社会首先是一个发展的、行动的社会,拥有生产和再生产自身及环境的能力,“社会不是它是什么,而是它使自己成为什么”(Touraine,1977:4),其本质在于自我创造的动态过程。这一立场在《呐喊与眼神:社会运动的分析》(*The Voice and the Eye: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vements*)中进一步深化,该书首章标题“人类创造他们的历史”直接呼应马克思(2011:408)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又强调社会系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能够“自主生成目标体系与规范性框架”(Touraine,1981:59),并通过行动创造自身的历史(Touraine,1977)。在此脉络下,图海纳指出“社会是一个分层的行动系统,即行动者之间社会关系的集合,其中存在利益冲突的行动者在同一社会领域内共享相同的文化取向”(Touraine,1981:25)。这一定义视社会为行动者间关系的动态演变过程,明确了行动社会学的核心研究对象是社会行动。

在《行动社会学》法文原版序言开篇,图海纳便确立了其理论纲领——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行动的知识(参见图海纳,2012:序言)。那么,何为社会行动?图海纳的思考可追溯至其对劳动的哲学反思(景天魁,2014),他指出:“通过劳动,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不仅改变了其物质环境,而更重要的是,这个群体或这个社会意识到了自己是历史的行动者,即一定历史变革的创造者”(图海纳,2012:3)。这意味着其劳动概念已超越职业活动范畴,承袭马克思实践哲学传统,指向蕴含创造性变革本质的人类活动(Alexander,1999),其核心在于劳动者对自身作为历史创造者的自觉。

基于对劳动本质的认识,图海纳批判了韦伯和帕森斯的行动观。他认为,韦伯虽强调行动的社会属性,却仍预设社会行动的驱动力是一个连续的理性化和技术进步过程,未能摆脱“元社会保障”(上帝、法律、自然等)的虚假幻想;帕森斯则将社会行动简化为由价值共识驱动的系统再生产,价值规范本身沦为未被解释的“黑箱”。综观其论述,图海纳对社会行动的界定可从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加以理解:在目标层面,社会行动指向集体、历史的目标(如经济发展),不可化约为个体心理意图;在情境层面,行动发生在受到规则支配又不断被冲突解构的社会关系中;在媒介层面,行动的互动与意

义依赖于符号系统(尤其是语言)(Touraine, 1974a, 1974b)。图海纳的行动观尤为强调人类主体的创造力,但也因此招致批评,被指过于凸显行动而弱化结构,近乎一种“纯粹行动理论”(Knöbl, 1999)。事实上,行动社会学并非否定结构的存在,而是主张在行动框架内重新理解结构。传统分析常将文化取向及其价值观视为行动的外在前提,而图海纳则将规范与价值的生成过程视为社会行动自身的运行机制,揭示出塑造和强化价值体系的内在力量(Arnason, 1986)。如他所言:

(行动社会学)不是从行动的标准取向着手深入探讨制度规范以及由其控制的言谈举止,而是沿着相反的运动方向,试图在制度压力的背后重新找到行动者的“规划”(project)。(图海纳, 2012:87)^①

社会行动始终嵌于意义框架内,行动者的行动图式与身份认同也在互动中被不断重塑。社会行动既是社会学习的过程,也是集体意志的生成机制——它既复制并强化既存结构,又孕育出新秩序的可能性(Eyerman, 1984)。行动者通过图海纳(2012:序言)所说的“创造、革新和意识赋予的过程”,推动社会共识与规范的持续更新,从而重构社会图景。因此,理解社会再生产与变迁,必须从那些在冲突中试图改变文化方向与既有社会秩序的行动者入手。行动社会学的理论超越性,体现在将社会行动从满足系统结构与功能需求的从属地位,确立为自主界定社会关系的本体力量。正是在此意义上,它能够揭示决定行动取向的价值观如何生成与发挥作用(图海纳, 2012),进而发掘被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长期掩蔽的社会变迁动力。

三、行动社会学对社会变迁议题的重释

在图海纳看来,社会行动不仅是社会生成的本体,更是历史进程得以启动和改变的关键力量。他将社会行动置于理解现代社会变迁的核心地位,

^①译文略有修改。“规划”一词源自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用以指涉人类通过不断自我建构,超越既定存在。图海纳将其引入集体行动分析,指出(个人生活)规划是一种努力,其目的是使个性免遭破坏,且能在技术和经济活动中发挥经验与文化的作用(图海纳, 2003:20)。

旨在挑战传统理论对社会的静态认知,揭示行动如何通过冲突与创造推动历史进程。为此,他构建了以“历史质”与“历史主体”(historical subject)为核心的动态分析框架,并发展出“社会学干预”方法,为理解社会转型提供了新的解释工具与实证路径。

(一)历史质与历史主体:社会变迁的场域与动力

图海纳引入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的社会想象力理论,将抽象的“想象力”(imaginary)^①转化为可操作的“历史质”,并结合经验研究深入探讨行动的创造性(Joas & Meyer, 1989)。所谓历史质,是指“社会通过自身活动创造其社会与文化场域、历史环境,并赋予这些实践以‘意义’的能力”(Touraine, 1977: 16)。图海纳将这一概念分解为知识模式、积累模式与文化模式三个相互关联的要素。其中,知识模式表现为社会的认知体系,包括科学理论、认知结构与表达经验的语言方式(Touraine, 1977: 18);积累模式表现为社会通过经济与知识生产进行资源积累,并形成相应的社会分层与阶级关系(Touraine, 1977: 66);文化模式则构成历史质的核心,它能够激发创造力并将其制度化,从而在主导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体系之外建构变革的想象图景(Touraine, 1977: 4, 66; Kivisto, 1984)。三者通过集体行动嵌套在一起,推动社会从封闭的再生产系统转变为开放的动态生成过程。而文化模式所蕴含的规范性取向一旦被行动者接受并内化为有效规范,便会固化为维持秩序与制度运作的组织原则,最终体现为社会各领域的制度体系(Eyerman, 1984)。因此,制度体系可视作历史质在规则层面的投射,其稳定性与历史质的强度呈负相关:在历史质较弱的社会,文化模式受制于神权或自然法等超验秩序,人们只能将这种不受理性支配的状态视为正常;反之,在历史质较强的社会,制度、组织模式与文化价值观持续受到变革或变革诉求的冲击与破坏(Touraine, 1977: 19; 图海纳, 2012: 27、48)。历史质因而成为社会行动者竞相争夺的关键场域,其内在张力不断激发社会冲突,使得社会结构保持动态与开放。

如果说历史质界定了社会变迁发生的场域与可能性,那么历史主体便

^① 卡斯托里亚迪斯认为,社会制度、规范和文化并非对现实的被动反映,而是人类通过想象力(即创造意义的能力)主动建构的,是人类想象力的具象化(参见 Joas & Meyer, 1989)。

是推动这一变迁的集体力量。图海纳批判性继承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主张社会行动是集体的创造(图海纳,2012:18)。他提出以“历史主体”取代个体化的个人主体或人格主体,将规范起源与价值生产置于集体行动之中,从而摆脱抽象结构与功能系统对行动者的被动设定。图海纳并未否定个体的作用,而是强调个人主体是在具体情境中被激发出创造意愿,并朝向历史主体发展的那部分自我(Martuccelli,1996)。个人主体由其所追求的“规划”所界定,规划的层次决定了其参与历史主体建构的深度。因此,个人主体是历史主体形成的具体起点,任何行动者只要其行动体现了历史主体的意向或价值取向,就实质上参与了历史主体的建构(图海纳,2012:86、244)。历史主体并非特定阶级或群体,而是试图重塑社会意义与规范的集体力量,是在最高层次上进行斗争的主体,即历史质的主体(Touraine,1985)。它体现了人类对自身创造及其成果的反思与掌控欲望,是社会变迁的根本动力。

在经验层面,图海纳将历史主体具象化为“社会性运动”(societal movements),即围绕历史质控制权展开争夺的集体行动(Touraine,1977:298)。社会性运动直指核心社会冲突及其背后的深层社会议题,旨在挑战并改造社会的基本价值体系(Touraine,2004)。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性运动须符合三项原则:参与者具有明确的身份认同,具有自觉的对抗意识并能识别对手,能够对社会发展模式提出质疑和整体性重构方案(Touraine,1977:310-318)。因此,社会性运动可被视为实现某种社会愿景的创造性行动,当参与者内化这一愿景,行动便能冲击支配结构、孕育新的文化形态。正因如此,社会性运动是规范性取向生成和演变的关键机制(Touraine,1981;图海纳,2008:82)。在不同历史情境中,社会行动围绕历史质提出不同诉求,重构规范结构与文化方向,展现出了作为历史主体的能动性 with 进步意义。

社会变迁的本质在于突破传统制度、规范体系、象征秩序与权力关系的惯性束缚。过度关注价值规范系统的内在一致性,容易将社会简化为遵循主导价值的静态系统,忽略其深层的自我转型能力。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虽预设价值共识可以维护社会稳定,却难以揭示深层变革的动因,其静态的规范内化模型也忽视了冲突与文化创造在社会演进中的作用。行动社会学基于历史质与历史主体的相互建构,对这种传统的社会再生产范式进行根本性批判。历史质兼具规范整合与利益冲突的双重特征(Scott,1996:79),它既承认文化规范和社会支配关系对行动者的结构性制约,又强调历

史主体“改写”这些模式的可能性。这一理论将社会变迁的源泉从僵化的内部结构转向能动的行动者,实现了社会结构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与行动者的创造性实践在历史进程中的融合,避免陷入“社会学还原主义”(sociological reductionism)(DiTomaso, 1982)。

然而,历史质与历史主体也因高度理论化而遭受批评。布迪厄曾以“行动社会学是可能的吗?”为题,质疑图海纳将价值体系归因于历史主体创造成果的观点,认为其过度依赖直觉而非实证,预设了历史动力和社会行动意义的统一性,落入历史哲学的陷阱(Reynaud & Bourdieu, 1974: 112)。达洛尼·马尔图切利(Danilo Martuccelli)也指出历史主体的概念过于抽象,缺乏扎实的社会分析与经验支撑,存在“预言社会学”之嫌(Martuccelli, 1996)。图海纳从理论层面回应称,历史主体是分析行动规范性取向的工具,其意义需要通过社会冲突与实践间接揭示(Touraine, 1974a)。为弥补经验性不足,并验证“社会的生产”这一命题,他发展出了社会学干预方法。

(二)社会学干预:主体潜能的辨析与催化

社会学干预高度重视行动者反思和解释自身行为与社会情境的能力,将行动者的实践意识(practical consciousness)视为社会行动分析的起点与核心资源(Hamel, 1998)。该方法强调行动者与研究者在知识上的相互建构关系(Touraine, 1980)。研究者以“助产士”或“催化剂”的身份介入,通过组织小组讨论、反思性对话与社会情境再现,协助行动者辨识其所处的社会关系、冲突结构和文化取向(Dubet & Wiewiorka, 1996)。在研究者与行动者的深度互动中,社会学干预力图实现两个目标:其一,揭示那些未被充分觉察的行动意义与历史潜能,阐明集体行动在文化与政治冲突中的生成与演变逻辑,从而探寻社会变迁的潜力与方向(Touraine, 1980;图海纳, 2008: 134);其二,增强行动者对自身处境与斗争意义的理解,并将其转化为实际的行动能力,促使行动者成为真正的历史主体,最终发起或参与能够重塑历史质的社会性运动(McDonald, 2002)。

社会学干预通常依托于一个10~15人的小组展开。小组成员面对同一社会冲突,但背景多元,故能充分反映冲突的内部逻辑与经验结构。干预过程包含三个主要阶段:第一,组建干预小组并引入对话者。此阶段旨在突破日常状态下社会关系被支配秩序遮蔽、行动者反思受制于结构性压力的难

题,复现行动者的社会经验与行动过程(Touraine, 1981: 161-165, 2000)。为此,研究者安排行动者与不同立场的对话者(如支持者、反对者或制度代表)交流。这些对话者映射出行动者所处的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使行动者在交锋中辨识对手、激活集体认同,并在叙事被挑战、质疑或强化的过程中,暴露行动中的张力、困境与可能性(McDonald, 2002)。研究者则从中观察行动者如何理解、应对乃至主导其日常斗争中的核心关系。第二,自我分析与引导。研究者组织封闭会议,通过提问、情境比较与历史材料提示等方式,引导小组成员对前期对话进行自我分析,推动他们从经验叙述迈向对行动意义的批判性阐释,识别行动中的矛盾、目标及可能的集体规划。第三,转换(conversion)。基于行动者的自我分析,研究者提出关于行动可能蕴含的“最高意义”的理论假设,激发行动者构想宏大社会方案的能力,并观察小组能否据此重新调整行动与策略,形成更清晰的集体愿景。这一过程需要通过多组比较与长期跟踪来循环验证,强调研究与行动间的持续双向建构与修正。

社会学干预并非“发现”一个已然存在的主体,而是将历史主体的生成置于研究实践的核心位置。正如图海纳所言,行动者的定义根植于他们与自我的关系,以及将自我构建为能够改变环境并增强自主性的主体的能力(Touraine, 2000)。通过再现和激活社会关系,社会学干预构建出一种分析性情境,克服了问卷调查、参与观察等方法在捕捉社会生产方面的局限。干预小组作为集体行动的某种缩影,既反映了社会冲突的内在本质,也呈现出行动者在冲突中构建自身行动意义,并最终为社会价值与文化模式而斗争的过程。干预小组也代表正在形成的变革,能够激发行动者对自身处境与实践的反思,并基于对潜在行动意义的认识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诉求与替代性社会方案(Touraine, 1981: 141-144, 148)。因此,社会学干预不仅是行动社会学的实践操作与检验工具(Dubet & Wieviorka, 1996),更是一种直接介入政治与社会过程的社会学实践(Hamel, 1998)。它体现了图海纳对社会行动和社会学家角色的深刻反思:社会是在行动者的冲突与互动中持续自我创生的,社会性运动的意义只有在行动者与系统的对抗及其自我反思中才能充分显现;而社会学家的任务则是揭示被权威遮蔽的冲突、诉求和创造性自由,发掘那些努力成为历史主体的行动者(Touraine, 1980, 1981: 139-140)。

总而言之,行动社会学通过历史质的概念揭示社会自我生成与发展的内

在动因,以历史主体的概念确立社会变迁的能动主体,最终通过社会学干预方法将理论转化为介入现实、探寻和激活社会变迁潜能的研究实践。这一系列理论建构与方法创新,推动了社会学从关注“社会如何维系与再生产”转向追问“社会如何生产自身”,从而完成了对传统社会变迁逻辑的深刻批判与重构。

四、主体化:行动社会学对现代性危机的理论回应

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加速了工业社会组织与整合机制的瓦解,历史主体模型遭遇行动碎片化与认同危机加深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图海纳将研究焦点从社会结构与集体行动的生产机制转向“主体”(the Subject)^①本身及其生成过程,以使行动社会学重新获得对当代社会变迁的解释力(Touraine, 2004, 2005b)。由此,行动社会学开始重视个人主体这一最基本的行动单位。

(一)全球化浪潮中行动社会学的理论危机

图海纳认为,后工业社会的出现与更高层次的历史质相关,也将催生类似工业时代工人运动的新型社会冲突载体(Touraine, 1981:24)。然而,他与团队于20世纪60—80年代对新社会运动的研究并未发现能够继承工人运动历史使命的集体行动,反而目睹了新社会运动的衰落、个人主义的兴起,以及“社会反运动”和民粹主义的复苏。图海纳试图以转型过渡期和发展阶段重叠来解释这一矛盾,认为后工业社会的文化形态虽已初现,但其社会结构与组织模式仍固着于工业社会框架(图海纳,2008:209)。但这一解释却凸显出行动社会学的内在张力:它既批判功能主义的决定论倾向,强调开放系统中社会行动的多种可能,又隐含社会形态线性演进的目的论预设,导致其在解释后工业社会的现象时陷入验证危机(Scott, 1991; Knöbl, 1999)。图海纳不得不承认,基于工业社会经验所构建的历史主体分析原则,已难以捕捉后工业社会中新型行动者的生成逻辑与集体行动动力。

^① 图海纳批判将主体视为知识和权力建构产物的观点,因此他区分“subject”与“Subject”两种书写形式。其中,小写“主体”(subject)指受外在力量支配的被动个体,而大写“主体”(Subject)是在改造世界的同时重塑自我、具备自我创造能力的积极行动者(Fine, 1998)。

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动摇了行动社会学对社会内生变革可能性的预判基础(Bell,2000)。金融全球化使经济体系开始挣脱国家约束,形成超越制度管控的自主领域,削弱了国家维持社会运作的能力(图海纳,2003)。“社会运作的具体统一性虽仍依托国家形式存在,却已无法通过共享价值观、规范体系或政治规划实现社会整合”(Touraine,1995:355),社会团结面临危机。社会纽带的断裂致使社会行动者陷入两种极端:在经济领域,个体参与简化为纯粹的工具理性与无意义的模仿性消费;在文化领域,个体则退缩至道德、民族或宗教等封闭认同中寻求安全感(图海纳,2003:26-70)。图海纳将这一经济与社会、市场与文化、系统与行动者之间的断裂过程称为“逆现代化”(demodernization)(图海纳,2003:26-70),并认为它预示着人类正走向以文化为核心的“后社会”(post-social)形态(Touraine,2007b:187)。

面对“逆现代化”所引发的社会学范式危机,图海纳以“流动的景观”(fluid landscapes)为喻,形象地指出社会已从古典理论中稳固的“石头城堡”演变为充满不确定性的流动体(Touraine,2007b:93)。这导致个人身份不再由社会功能或地位界定,基于阶级、社会运动或社会化机构等范畴的传统分析范式随之失效,“社会”这一分析单元本身也受到挑战(Touraine,1998a)。然而,图海纳对此仍保持审慎乐观(Beckford,1998),他批评后现代的悲观论调“过于短视,忽视了人类反思能力与历史意识”(Touraine,2004:442),并坚定宣称:“历史的火焰并未熄灭,我们生活在超现代社会(ultramodern society)的炽热中,而非后现代的寒冷中。因为在全世界所有社会生活领域,行动者正在回归”(Touraine,2007a:189)。据此,图海纳主张将社会行动的研究重心从“理解社会”转向“发现主体”,探究和识别社会行动者的生成条件与主动性,以助推新行动者的涌现(Touraine,1998a,1998b,2002)。这一视角转换为行动社会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定位社会冲突与集体行动提供了可能。

(二) 社会冲突的文化转向与个人主体的崛起

行动社会学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危机视为一种同时蕴含行动潜力的结构化进程(Bell,2000)。在图海纳看来,传统社会整合机制在瓦解的同时也为新型集体行动培育了土壤,社会成员因而有可能实现“既彼此平等又互有差异地共同生存”(Touraine,1998b:175、178)。利奥塔所说的“宏大

叙事终结”并不意味着彻底告别现代性,而是标志着“社会历史质的扩张”^①(Touraine, 2003)。在此进程中,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断催生新的冲突,推动社会意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Rucht, 1991; Vandenberghe, 2024)。

置身晚期现代性的困境,个体日益转向自我关怀、文化权利捍卫与身份认同重构(Touraine, 2005a: 236-238)。贝克等(2011:19-22)称之为“个体化”,并警示其可能削弱社会整合。图海纳则从“逆现代化”带来的身份碎片化中看到个体及边缘群体从自身经验内部寻求合法性的能力正在增强(Touraine, 2014: 135)。这种在社会剧变中通过“个人生活规划”主动将自身塑造为历史行动者的过程,即图海纳定义的“主体化”(subjectivation)(图海纳, 2003: 20-22)。这是一种“朝向自我的运动”,即在社会结构渐趋解体的背景下,个体为维护自身的独特性与完整性,持续对抗既有秩序、行为预期及权力逻辑,从而重建自我意义并夺回行动能力(Touraine, 1995: 292, 2005b)。与吉登斯将主体性视为一种自我实现的生活政治不同,图海纳赋予主体化更为深刻的政治与伦理内涵。他认为,成为“自觉主体”(committed subject)不仅关乎个体自由,更要求个体团结他者,将自由诉求嵌入社会斗争与文化解放的历史维度,为不同群体建立超越狭隘利益和封闭身份认同提供对话基础。换言之,主体化是一种将私人诉求公共化、将个体经验上升为普遍价值的能动实践,它通过重建公共性与跨群体对话使个体同时成为“意识与变化的创造者”和“社会关系与政治制度的创造者”(图海纳, 2003: 80)。

从上述视角出发,图海纳将主体视为“在一个土崩瓦解的世界里,现代性的唯一保护者”,它努力抵抗市场与社群的压力,推动劳动与文化实现统一(图海纳, 2003: 113)。但主体并非具体的个体行动者,而是一种“建构社会经验的原则”,其地位类似于工具理性在社会整合中的角色(Touraine, 1995: 234)。当主体对自由的抽象诉求嵌入具体的社会语境、文化传统和人格历史时,这一原则便在公共领域转化为政治辩论与集体行动(图海纳, 2003: 131)。随着个人主体的崛起,不同主流文化观念之间往往会出现对抗(Touraine, 2014: 17-20),性别、移民、生态等议题正是此类文化观念冲突的

^① 需指出的是,图海纳在20世纪80年代对“历史质”概念进行了重要修订,提出其三个组成部分(知识模式、积累模式和文化模式)均属于文化模式(图海纳, 2008: 41, 62)。在此框架下,历史质被赋予更为综合的文化内涵,强化了行动者的实践能力与其文化背景之间的联系(Arnason, 1986)。

具象化,体现了新的历史质的内涵。因此,主体的觉醒是促成社会整体价值反思与历史质重塑的关键。

图海纳指出,在全球化与个人主义盛行的时代,新的社会团结不再源于共同身份或利益,而基于对彼此“成为主体”权利的相互承认(图海纳,2003:188)。只有当不同文化背景的成员意识到彼此共享共同的人性,并达成主体间的相互承认时,跨文化沟通才具备伦理基础,由此形成的社会联结才能超越文化差异。为了重建充满活力的社会,图海纳提出三个条件:主要行动者的自我重新定义,对抗争对象的清晰认知,以及对社会行动者共同议题的深刻觉悟(Touraine,2014:103)。这一论述延续了行动社会学对社会性运动存在条件的剖析,并体现了其一贯的立场:社会核心冲突是推动历史演进的根本动力。图海纳因而呼吁将创造历史的权利归还给个体(图海纳,2003)。这指向了一种以主体化为核心的政治,即“主体政治”(politics of the Subject)^①。在此框架下,主体化与理性化是理解现代性的两大取向,二者间的张力不断引发社会冲突,构成现代性转型的内在动力^②。

(三)围绕主体化理论的争辩及其回应

学界对图海纳主体化理论的解读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强调其思想的连续性,认为其延续了《社会的生产》中对社会关系构成与后工业社会重建的探讨,关注社会场域的再整合;另一种观点则突出其理论的断裂性,指出他以现代性危机的激进诊断为起点,主张超越民族国家与社会等传统分析单位,转而从理性化与主体化的内在张力中把握世界本质(McDonald,1994)。这两种看似对立的视角共同体现了行动社会学回应当代困境的努力:既反思现代性的本质,揭示社会从工业时代的整合秩序走向碎片化的危机,又试图通过重新定义行动者,探寻危机突围的路径。

图海纳坦承:“我先后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将主体理论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写历史主体,然后才把个人主体放在中心位置”(Touraine,

① “主体政治”并不仅仅是身份政治或权利主张,而是强调个体与群体通过行动进入公共领域,以自身话语争取制度承认,使其诉求在法律、政策与公民权结构中得到落实。

② 图海纳主张,现代性的本质并非单一的理性扩张,而是理性与主体之间持续的互动和碰撞(Touraine,1995:6)。在传统社会,主体与理性共同对抗非理性权威(特别是神圣秩序与宗教体系),但随着生产机构组织化权威崛起,工具理性的扩张不断压制主体,二者由同盟走向对立,而现代性的前途正取决于这种张力如何被重新组织与平衡(Touraine,1995:235,296-297)。

1996:298),但他强调这种转变“在面对深刻变化的外在环境时保持了自身的连续性”(图海纳,2012:中译本前言)。本文认为,行动社会学的“主体”概念经历了从抽象到具体的演变,必须置于不同时代背景中加以理解。在工业社会,行动者受限于既定的社会角色(如工人、家长、信徒等),实为一种集体性或社群性主体,其关系重心在社会秩序而非个体,因而行动者积极通过阶级斗争等集体行动争夺社会发展核心资源的控制权。及至后工业社会,随着传统制度式微与个体化进程深入,个体的主体性不再主要依附于集体,而是体现在其作为能动者主动塑造自我的核心诉求上。行动者和社会性运动因此“不再以它们与社会的关系来定义,而以它们与主体的关系来定义”(图海纳,2003:142)。只有当社会冲突与指向主体的文化诉求相结合时,真正的社会性运动才得以产生。

基于上述逻辑,图海纳将当代社会性运动定义为“伦理-民主运动”(ethic-democratic movements)(Buccarelli & Causarano,2017)。个人主体被赋予强烈的伦理意涵,他们拒绝被简化为角色、身份或消费者,而是通过将苦难转化为权利诉求以成为自身(图海纳,2003:119)。因此,在经历宏观集体行动式微后,图海纳将理论焦点从集体主体转向个人主体,意在重新确立行动者在行动社会学中的核心地位。他将现代性的希望与革新动力寄托于个体的伦理自觉与文化实践,并以此重划行动社会学的理论疆界。

图海纳对主体的再界定,也是对社会科学界相关本体论争议的间接回应。例如,米歇尔·维沃尔卡(Michel Wieviorka)曾质疑:主体究竟是一种社会建构,还是个体与生俱来的属性?它建基于实践行动,还是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类潜能存在(维沃尔卡,2017:33)?对此,图海纳给出了融合结构与能动视角的辩证回答:“主体是与其置身之社会类型的文化模式或历史质有关的社会行动者”(图海纳,2008:209)。他反对将主体思想简化为纯粹个体主义,强调个体的诉求受社会情境的塑造与激发,而非源于某种先验的、完全自主的主体自由(Touraine,1996:299)。因此,图海纳既未将主体降格为原子化个体,也未将其抽象为普遍人性预设,而是坚持主体必须在具体历史情境与社会事件中生成、显现并验证自身。女性运动、移民运动等群体实践,正是主体化的具体体现。

主体化是图海纳理解和重建社会行动的核心概念。它连接了宏观的社会历史质与微观的个体自我建构,并有力回应了反思性现代性与个体化社

会等理论的挑战。主体化始于个体对自身行动、处境与欲望的反思,并进一步将个人生命轨迹与社会发展和民主进程相连接,以此重建个体与共同体的积极联结。这说明在旧式集体行动式微的背景下,个体能够通过自我反思与道德努力,重获能动性以抵御系统性支配。这种分析为晚期现代性中那些看似碎片化的个体行动重新赋予宏大意义。即便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下,个体的反思与主体化实践仍能孕育具有公共能量的社会变革动力。

五、结论与讨论

作为20—21世纪的重要社会理论家,阿兰·图海纳对社会行动及其生成机制的思考源自长期的实证研究与理论对话,而且他始终秉持着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与政治关怀。他建构的行动社会学将社会变迁的动力归因于行动者的能动实践,强调主体具有打破结构、重塑现实的潜能。这一理论为理解后工业时代的社会转型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也为重建社会团结指明了方向。本文通过梳理其理论演进脉络,从理论基础、范式创新与当代回应三个方面阐释了其思想内涵与学术价值。

行动社会学的认识论建立在对社会与社会行动的批判性重释之上。在该理论视角下,社会被视为动态且充满张力的关系网络,其本质是在持续行动中不断生成的过程;社会行动不仅能够改变互动关系形态,也深刻重塑着意义系统与规范结构。行动社会学的核心任务就在于揭示社会关系的生成机制与变革动力。进一步而言,行动社会学聚焦于历史质与历史主体的辩证关系,指出社会变迁的关键是集体行动对规范性导向的争夺。历史质指社会借助知识体系、资源积累与文化模式实现自我反思与创造性转型的能力,它构成了社会冲突的核心场域;历史主体则体现为行动者通过集体行动争夺历史质的主导权,冲击既有价值体系的根基,推动结构性变革。这一分析框架超越了功能主义与结构主义的线性变迁观,指明了社会变迁的深层动力与实践载体。在此基础上,图海纳提出社会学干预方法,主张研究者通过再现和介入行动者的冲突场域,增强其反思与行动能力,催化历史主体的生成。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引发的制度失序与个体化困境,对缘起于工业时代的行动社会学提出了挑战。对此,图海纳提出“主体化”概念,将分析单元从

集体主体转向个人主体。主体化强调个人主体基于伦理自觉抵抗工具理性与既定秩序,从而为“主体政治”乃至新的社会团结奠定基础。因此,主体化不仅超越了后现代主义的消极叙事,更凸显了个人主体在当代社会转型中的关键作用。这标志着一种根本转变:物质生产逻辑日益被具有象征意义的生产机制取代,对文化自主性、生活意义与个体权利的捍卫成为社会变革的核心动力。文化因此成为理解当今世界的新范式(Touraine, 2007b)。身份政治、性别平权、生态运动等新兴社会议题,均体现了后工业时代个体和群体通过争取自我定义权来捍卫生活世界。主体化由此构成理解当下个体如何将边缘经验转化为公共话语与政治资源的关键概念,也是识别社会转型中新兴能动力量的重要维度。不过,图海纳的分析偏重理性与认知层面,缺乏对主体化建构过程的社会学机制的详细论述(King, 2006)。为弥补这一不足,弗朗索瓦·杜贝(François Dubet)、阿尔贝托·梅卢奇(Alberto Melucci)和米歇尔·维沃尔卡等学者沿着行动社会学的脉络,将分析从宏观社会冲突移至微观个体实践与文化场域,更细致地描摹主体的生成及其与制度的关联。这些研究既延续了行动社会学的问题意识,也将其宏大而抽象的理论内核拓展至新的经验领域,增强了理论的可操作性。

行动社会学对个体主体性实践与宏观社会变迁之间有机联系的关注,为我们理解社会如何在内部张力中生成与变革提供了新视野,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社会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与文化转型交织,既释放出大量弹性空间,也深刻塑造了个体行动者的实践逻辑与意义世界。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与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认同、生活质量等文化性诉求日益凸显,逐渐成为推动公共参与和制度创新的重要力量。普通民众的行动不再局限于利益再分配,而更多诉诸对自身生活经验与生命意义的定义权(郑中玉、李鹏超, 2021)。主体化、历史质、文化冲突等核心概念,为研究个体行动与日常经验如何能动地介入社会进程、塑造文化转型并影响公共领域和政策制定提供了分析工具,有助于我们更敏锐地把握当代中国在文化观念嬗变、公共愿景生成与个体主体性崛起等方面的复杂图景,并有效识别那些超越单一经济理性的社会张力与变革潜能。

值得一提的是,行动社会学形成于二战后的欧洲社会,深受法国公民社会传统和西方现代性经验的影响,其关于社会演进具有明确阶段性的预设亦带有地域文化特征(Hamanishi, 2009)。然而,中国则经历着“并联式”叠

加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后工业文明的要素在当下中国同时存在(李培林,2021;李友梅,2024)。这意味着当前中国社会的冲突往往是复合性的,既包括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源分配与社会经济问题,也涉及后工业化阶段的价值认同、文化权利与生活方式之争。在此意义上,图海纳的“主体政治”构想为培育公共信任、探索共同生活的可能性提供了重要启示。需要注意的是,在借助行动社会学理解当代中国转型现实时,必须批判地吸收和转化其概念工具,构建更贴合本土实际的分析框架。

尽管行动社会学植根于西方语境,但其思想所蕴含的规范取向仍展现出超越地域的普遍关怀。图海纳的理论思考始终秉持以主体尊严为基础的规范性追求,致力于构建个体生活与集体生活的新模式。他批判传统社会学中“行动者的缺席”,主张社会理论应回归行动者本身,尤其强调国家在推动边缘群体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主流、促进社会团结中的积极作用。正如布迪厄所言:国家不仅具有“支配性面孔”,亦作为终极集体并展现出积极的规范性力量,能够构建追求集体共识目标的新型社会秩序(转引自郑琰、熊跃根,2023)。行动社会学不仅是一套分析工具,更承载着深刻的现实关切,其理论关怀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高度契合,为我们探索更具包容性的社会政策与治理路径、推动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提供了重要理论参照。

然而,全面把握图海纳的思想体系并实现其理论的本土化应用,仍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学术工程。目前,中文学界对其理论的引介与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这既源于法语文献译介不足,也源于理论接受过程中的选择性偏好。本文仅是对行动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与理论观点的探索性分析,未来可深入检视数字背景下“主体化”与集体行动的特征,以及中国情境中行动者的生成逻辑与国家角色的复杂关系等理论问题,尝试构建本土化的社会行动理论。

参考文献:

贝克,乌尔里希·伊丽沙白·贝克-格恩斯海姆,2011,《个体化》,李荣山、范譞、张惠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胡伟,1988,《战后法国社会学的发展》,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景天魁,2014,《从劳动理解社会——阿兰·图海纳的贡献》,《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李洁,2009,《行动社会学与社会学干预——阿兰·图海纳社会学思想的初步介绍》,李友梅、孙立平、沈原主编《转型社会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培林,1997,《四大流派——巴黎读书札记之一》,《读书》第4期。

——,2021,《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发展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

- 李友梅,2024,《新公共性与中国转型社会学理论范式创新》,《学术月刊》第2期。
- 刘建洲,2014,《农民工阶级的阶级形成与阶级意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马克思,卡尔,2011,《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冯适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沈原,2006,“强干预”与“弱干预”:社会学干预方法的两条途径,《社会学研究》第5期。
- ,2007,《社会的生产》,《社会》第2期。
- 施芸卿,2007,《机会空间的营造——以B市被拆迁居民集团行政诉讼为例》,《社会学研究》第2期。
- 孙立平,2005,《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第1期。
- 图海纳,阿兰,2003,《我们能否共同生存? 既彼此平等又互有差异》,狄玉明、李平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2008,《行动者的归来》,舒诗伟、许甘霖、蔡宜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2012,《行动社会学:论工业社会(1999年修订版)》,卞晓平、狄玉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维沃尔卡,米歇尔,2017,《社会学前沿九讲》,王鲲、黄君艳、章婵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文军,2017,《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发展社会学的中国观照及其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第4期。
- 肖林、陈孟萍,2021,《新清河实验与社会学干预的中介效应——基于“双轨政治”的思考》,《社会学评论》第9期。
- 肖瑛,2014,《从“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视角转换》,《中国社会科学》第9期。
- 郑琰、熊跃根,2023,《官僚场域的还原与共和主义的规范——论布迪厄国家学说的双重面孔》,《社会学评论》第4期。
- 郑中玉、李鹏超,2021,《超越“被简单化的民众”——历史街区改造中民众主体性视角的研究》,《社会学评论》第2期。
- Alexander, Jeffrey C. 1999. “Why We Might All Be Able to Live Together: An Immanent Critique of Alain Touraine’s Pourrions-Nous Vivre Ensemble?” *Thesis Eleven* 58(1).
- Arnason, Johann. 1986. “Culture, Historicity and Power: Reflections on Some Themes in the Work of Alain Tourain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3(3).
- Bauman, Zygmunt. 1983. “Book Reviews.” *Sociology* 17(4).
- Beckford, James A. 1998. “Re-Enchantment and Demodernization: The Recent Writings of Alain Tourain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1(2).
- Bell, Laurence. 2000. “Vicissitudes of Modernity: The Social Theory of Alain Touraine.” *Contemporary French Civilization* 24(2).
- Buccarelli, Filippo & Pietro Causarano. 2017. “Society, Politics, Grass-Root Democracy: A 21st Century Agenda. An Interview with Alain Touraine.” *Cambio: Rivista sulle Trasformazioni Sociali* 13(1).
- DiTomaso, Nancy. 1982. “‘Sociological Reductionism’ from Parsons to Althusser: Linking Action and Structure in Social Theo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2(1).
- Dubet, Francois & Michel Wieviorka. 1996. “Touraine and the Method of Sociological Intervention.” In Jon Clark & Marco Diani(eds.), *Alain Touraine*. London: Routledge.
- Eyerman, Ron. 1984. “Social Movements and Social Theory.” *Sociology* 18(1).
- Fine, Robert. 1998. “The Fetishism of the Subject? Some Comments on Alain Tourain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1(2).
- Hamanishi, Eiji. 2009.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a Central Thesis in Touraine Sociology: The Possibility of a ‘Strong’ Social Movement Theory, De-Frenchifying Views of Japan.” *The Journal of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Sociology* (3).
- Hamel, Jacques. 1998. “The Positions of Pierre Bourdieu and Alain Touraine Respecting Qualitative Method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9(1).

- Joas, Hans & Raymond Meyer. 1989. "Institutionalization as a Creative Process: The Sociological Importance of Cornelius Castoriadis's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5).
- King, Debra S. 2006. "Activists and Emotional Reflexivity: Toward Touraine's Subject as Social Movement." *Sociology* 40(5).
- Kivisto, Peter. 1984.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s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ies and Sociological Intervention: An Appraisal of Alain Touraine's Pratique." *Acta Sociologica* 27(4).
- Knöbl, Wolfgang. 1999. "Social Theory from a Sartrean Point of View: Alain Touraine's Theory of Modernit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2(4).
- Martuccelli, Danilo. 1996. "Alain Touraine's Conceptions of Modernity." In Jon Clark & Marco Diani(eds.), *Alain Touraine*. London: Routledge.
- McDonald, Kevin. 1994. "Alain Touraine's Sociology of the Subject." *Thesis Eleven* 38(1).
- . 2002. "L'Intervention Sociologique after Twenty-Five Years: Can It Translate into English?" *Qualitative Sociology* 25(2).
- Reynaud, Jean-Daniel & Pierre Bourdieu. 1974. "Is a Sociology of Action Possible?" In Anthony Giddens(ed.), *Positivism and Sociology*. London: Heinemann.
- Rucht, Dieter. 1991. "Sociological Theory as a Theory of Social Movements? A Critique of Alain Touraine." In Dieter Rucht(ed.), *Research on Social Movements: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SA*.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 Scott, Alan. 1991. "Action, Movement, and Intervention: Reflections on the Sociology of Alain Touraine."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28(1).
- . 1996. "Movements of Modernity: Some Questions of Theory, Method, and Interpretation." In Jon Clark & Marco Diani(eds.), *Alain Touraine*. London: Routledge.
- Touraine, Alain. 1971.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Tomorrow's Social History: Classes, Conflicts, and Culture in the Programmed Society*. Trans. by Leonard F. X. Mayhew. New York: Random House.
- . 1974a. "Towards a Sociology of Action." In Anthony Giddens(ed.), *Positivism and Sociology*. London: Heinemann.
- . 1974b. "The Raison d'Être of a Sociology of Action." In Anthony Giddens(ed.), *Positivism and Sociology*. London: Heinemann.
- . 1977. *The Self-Production of Society*. Trans. by Derek Coltm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1980. "The Voice and the Ey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tors and Analysts." *Political Psychology* 2(1).
- . 1981. *The Voice and the Eye: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vement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85.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ocial Movements." *Social Research* 52(4).
- . 1995. *Critique of Modernity*. Trans. by David Macey. Oxford: Blackwell Press.
- . 1996. "A Sociology of the Subject." In Jon Clark & Marco Diani(eds.), *Alain Touraine*. London: Routledge.
- . 1998a. "Sociology without Society." *Current Sociology* 46(2).
- . 1998b. "Can We Live Together, Equal and Different?"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1(2).
- . 2000. "A Method for Studying Social Actors."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VI(3).
- . 2002. "From Understanding Society to Discovering the Subject." *Anthropological Theory* 2(4).
- . 2003. "Sociology without Societies." *Current Sociology* 51(2).
- . 2004. "The Subject and Societal Movements." In Judith R. Blau(ed.),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olog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 2005a. “The End of the ‘Social’.” In Eliezer Ben-Rafael & Yitzak Sternberg(eds.), *Comparing Modernities: Pluralism Versus Homogeneity. Essays in Homage to Shmuel N. Eisenstadt (Vol. 10)*. Leiden: Brill.

——. 2005b. “The Subject Is Coming Bac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18(3-4).

——. 2007a. “Sociology after Sociolog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10(2).

——. 2007b. *A New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Today’s World*. Trans. by George Suleima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2014. *After the Crisis*. Trans. by Helen Morris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Vandenberghé, Frédéric. 2024. “The Rise and Fall of Social Movements: A Tribute to Alain Touraine (1925—2023).”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27(1).

Reconstruction of Action and Return of the Subject: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Reassessment of Alain Touraine’s Sociology of Action

WU Fulan XIONG Yuegen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Alain Touraine’s sociology of action, focusing on its conception of social action and the logic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centered on “the Subject”. First, the theory places social action at its core, viewing it as a creative practice through which actors reinterpret social meanings and norms. Second, it elucidates the field and dynamic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outlining how collective subjects drive structural change through societal movements that contest control over historicity. Touraine further introduces “sociological intervention” as a method to identify and catalyze the transformative potential of collective action. Finally, addressing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in the globalization era, the theory shifts to the mechanism of “subjectivation”, emphasizing the pivotal role of “the Subject” in resisting alienation and rebuilding solidarity. In this way, the sociology of action establishes an analytical link between individual emancipatio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which not only deep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generation and change, but also offers a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comprehending the surge of subjectivity and new forms of actions within Chin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sociology of action, social action, historicity, subjectivati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责任编辑:张小菲)